◆观 点

社会科学“升级换代”需文化自觉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对这一伟大成就的学术阐释和理论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多年来在学科建设、人才队伍、研究成果等方面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比照中国的独特发展成就，中国的社会科学仍难脱“在中国的西方社会科学”之讥。例如，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尚缺乏完整规范的学术训练、严谨善意的学术争鸣和科学有效的学术评价，缺乏有针对性的跨学科知识训练和实证方法习惯，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创新和发展。目前，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三种能力的缺失密切相关。一是缺失处理社会理论与社会事实相结合的能力。二是缺失整合相关系统以形成自主学术生态系统的能力。三是缺失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传统对接的能力。今天，我们对于中国成就、中国道路的未来发展具有更大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信。同样地，我们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实现未来的创新发展，完成“升级换代”，理应有更大的学术自信和更强烈的理论自觉。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理路要在高度的文化自觉基础上，摆脱西方学术殖民化的影响。所谓文化自觉，简单地说，就是知道自己民族的文化从哪里来，现状如何，应该及可能到哪里去。中国学术的历史使命必然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自觉建立与中国社会发育发展内生的总体关系，要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更多地关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现实，加强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实证研究的手段，推进中国问题的研究和破解。客观来讲，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必要引进和学习，是为了进一步丰富和加深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内涵和理论阐释能力；对西方和整个世界的研究，应有利于建构中国问题研究的全球视野和比较空间。明确了这样的学术主体性，我们不可能把社会科学在西方的历史文化和时空基础上所产生的理论逻辑进行完整“移植”，不能以此作为描述甚至解释中国问题的完整逻辑定位和唯一评价指数，更不能在被学术“殖民”中自足自娱。在学术能力和学问价值的意义上，植根于中国本土的实践价值和文化价值，以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中国语境的学术话语方式，才更有恒久的学术生命力。

其次，中国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要在整体规划的前提下，实现有针对性的实践创新。中国社会科学界有一支勤奋聪明的学术队伍，亟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质量保障体系，确保在学科配套、人才培养、知识生产和应用尤其是学术评价等全方位全链条上形成积极的制度支持和相互关切，鼓励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话语的知识体系的良好学术导向。要针对教育领域、实践领域、研究领域的不同需要和价值取向，确立社会科学应用和评价的不同尺度与相互照应，避免不恰当的评价对人才培养和实践能力提升的干扰或隔断，才能够既保持自己学术原创的自主性，又切实发挥总结中国本土经验的积极性。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的价值指向要在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中，承担中华学术文明永续传承的历史重任。在学术发展中，如果理论研究日益功利，学术批评日趋恣意，讨论争鸣日渐失范，任何学术部门都将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现实成就。对于中国社会科学而言，一切需要起身而做，就是要回到以讲理、科学、理性、良知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深厚土壤中。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作为一个深嵌于世界结构之中的现代国家，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有着浓郁的本土特色，由此产生的社会科学研究向度与方法同样具有独特的世界性价值。中国道路越走越宽，中国社会科学完全有责任实现“升级换代”，展示和传播当代中国对世界的学术影响力。(2014年4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陆丹)

政府改革处于公共治理变革核心

过去的30多年，我们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干展开各项改革，其他改革说到底是为经济改革服务的。但是我们越来越看到，党政机构、政府越来越成为社会矛盾的中心，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所以尽管这次三中全会决定说，未来我们要以经济改革为牵引，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但是，经济改革目标的实现，主要障碍都不在于经济领域，而在于政府，根本是政治行政领域改革，这是当前深化改革的关键问题。公共治理变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其中党政机构和政府又处在公共治理变革的核心地位。

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其他各项改革能不能推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进，几乎都和执政党、政府有关。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生态改革、执政党制度的改革，这六大改革每一项都和执政党、政府自身有关。以经济改革为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投资体制改革，这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好改的早改过了，剩下难改的都和政府有关，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这些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第二，政府治理的能力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的成效。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包括很多内容，既包括组织体系、法制体系、体制机制，也包括管理观念、管理水平，是全方位的。在整个国家治理架构中，政府治理处在第一线，国家治理很多目标通过政府治理来实现。如果政府自身问题不解决，能力不高，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的治理水平。第三，从政府层面来讲，至少现在我们还有三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其一，整个治理结构不够科学，不管党政的问题也好，政府内部的组织架构也好，都还有很多关键性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二，政府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老百姓的认可。这些深层次问题包括：转变政府职能滞后的问题；政府自身改革滞后的问题；行政审批过多过滥变成腐败温床的问题；还有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薄弱的问题。在这些关键问题上，老百姓不满意。其三，政府形象问题。政府的行为一直得不到有效控制，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劳民伤财，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所以从这些方面讲，公共治理变革的紧迫性可想而知。

此外，有五个核心议题亟待解决。第一，重构政府和市场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逐步使政府治理现代化。第二，全力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第三，创新社会治理，释放社会活力。第四，用法律构建制度笼子，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第五，加大党政自身改革力度，提高公信力。(2014年9月23日《经济参考报》汪玉凯)

◆纵 横

美国的经历提供给大国崛起的启示

尽管中美两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发展环境大不相同，但19世纪后半叶美国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也可资观察中国快速发展面临的问题。中美两国均以惊人的速度获得迅猛发展，城市扩张，物质财富增加，生活也是显得紧张忙碌。美国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和技术强国。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36年里，在全球化背景下，以空前的速度推进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经济增长与物质繁荣背后所呈现的尖锐社会矛盾和冲突乃至体制缺陷，严重地制约着国家对实现本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发展目标的追求。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国民，均需适应工业和城市发展所刺激起来的社会与文化的变化，须调整其法律和行政管理方法，以适应一种充满巨变且错综复杂的时代。

20世纪初美国开启的进步时代，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治理，为后来美国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乃至称雄世界提供了可能。有三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威廉·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任职于这个时代，他们的施政理念和政策实践可以给人们提供一定的启示。

第一，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倡导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制约大企业垄断的“公平施政”理念。罗斯福把总统称为“人民的管家”，并使自己成一个强势总统。他上任后，便着手弄清楚当时存在的重大的全国性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并争取获得选民和国会的支持和同意。在他看来，“政府是否有能力控制托拉斯”是一个重大问题。必须树立联邦行政部门的权威，利用反托拉斯法去对付企业垄断或商业不公正行为，譬如政府对美国烟草公司、杜邦公司、纽黑文铁路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进行起诉。不过，他也意识到，工业发展是必然的，大企业为国家赢得了世界的工业领导地位，因此对托拉斯实施打击但不是破坏它。美国需要大企业，但要求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去监督它们。

需要提及的是，正是在罗斯福执政时期，随着马汉的“海权论”问世、美西战争的经验以及对德国和日本日益膨胀野心和势力的认识，美国开始建立一支旨在确保自身利益、放眼全球的强大现代化海军力量。

第二，通过立法途径治理国家。威尔逊认为只要国家对竞争加以保护和鼓励，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原则将会发挥作用，但憎恨政治上和商业上的腐败现象。他主张以立法形式去规范政治及商业竞争行为。1913年通过的关税法使许多特权得以被取消。联邦储备法是威尔逊任内最重要的法令之一，它纠正了美国银行业和通货中几乎所有的弊端。在稍早的1906年，美国国会更是通过了《卫生食品和药品条例》和《肉类检验条例》。

第三，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着手对社会进行改良。一方面，社会知识界、新闻界和文艺界对社会弊端及丑恶悲惨现象给予无情的揭露和尖锐批评。“丑事揭发者”们利用他们以事实为基础的生动作品(这个时代造就了小说家德莱塞、杰克·伦敦，以及小说《鲟鱼》的作者诺里斯，还有现实主义画派和“垃圾箱画派”等)，唤起美国社会道德及良知的重新觉醒，铲除愚昧和无知，促使社会发生新变革。另一方面，政治及知识精英们系统地提出实施社会改革赖以采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倡导对社会难题和危机实行有效管理和控制。他们既提出对呆板拘谨的思想体系抱怀疑和批评态度，又认为以条理严谨、冷静而科学的方法作为改造社会的根本原则。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以及经验实证方法，成为当时用于改造美国社会的一剂良方。(2014年9月15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刘永涛)

◆史海钩沉

雍正山西治腐

历代，山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兴盛的商业备受朝廷重视。尤其到了明清，山西官员已经占据朝中多数席位，而山西也因此屡现巨贪，成为反腐焦点。清雍正帝便以山西为起点推行“火耗归公”与“养廉银”的措施。

京师大贾数晋人 太原门户危都城

明代中后期山西社会经济便已有了极大发展，商业兴盛。而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也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当时在北京便有“京师大贾数晋人”的说法，而在《广志绎》曾记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可见晋商之富。

到了清代，晋商已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商帮。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在取得辉煌业绩、为山西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标的物。

山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北京成为都城后，太原便成为京师的门户，直接关系着京师安危。政府向山西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以确保山西的稳定。可在军饷方面却发生了五花八门的腐败现象，吃空额、冒滥军功成为军队中的一个常见现象。

朝廷晋籍官员多 地方盘根错节广

山西经济的崛起，为晋籍子弟读书入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由于深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许多商人会让自己的孩子读书应试，于是许多商人子弟由此走上了入仕做官之路。例如隆万年间的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的王崇古，万历时的首辅大臣张四维就是其中的典型，王家和张家都是大盐商。

而山西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一批熟悉地理的山西籍文臣武将迅速崛起。仅明代中后期晋籍官员中身为宰辅者便有5人，官至六部尚书、侍郎、都御史、通政使、总督、巡抚、总兵的高官则多达30人。而这仅仅是在中央，地方的官员尚未计算在内，由此可见其在政府中的比重之大。

到了清代，随着山西经济地位和国防地位的进一步上升，使得晋籍官员在政府的比重较其他地区有着更加明显的优势。而且清代高级官员，尤其是一二品的高官，一般都兼有商人、地主、高利贷者等多重身份，这使他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格外复杂，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许多高官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同时又以手中的权力换取财富。

此外在山西任职的官员的关系往往也是千丝万缕。如康熙朝噶礼贪污案中，噶礼就任山西巡抚时就与太原知府赵风诏及地方官员勾结，全然不顾民生，大肆贪污搜刮，相互勾结包庇，牵连官员人数甚广，最终查处的噶礼贪污一案官员人数达200余人。涉及范围之广、人数之多令人咋舌。而且其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官员腐败形式多样：贪污受贿、买官鬻爵、横暴豪夺、敲诈勒索、经商牟利、渎职失职、盘剥百姓等。贪官们成为了利益群体、官官相庇，腐败呈现出集团性，使腐败之风迅速蔓延。

推行“火耗归公” 山西作为起点

雍正帝在位时一改康熙帝在位时对官场“潜规则”的态度，推行了一系列的反腐措施。

雍正帝以山西为起点推行“火耗归公”与“养廉银”。由于地方官在征收钱税时，会以耗损为由，多征钱银，称为火耗或耗羡，但耗羡的范围大于火耗，耗羡还包含雀鼠耗等。通常，地方官征纳运到京城的谷物，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被雀鼠偷食损耗，称为雀鼠耗。此项政策在汉代便有，而在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正式实施耗羡归公，最早便在山西推行，七月，正式推广至全国。并且明确了规定了耗羡征收的比率标准，据孙嘉淦在《办理耗羡疏》中对耗羡征收率的记述，耗羡征收率被统一定为一成。虽然，当时的耗羡征收率是否如孙嘉淦所说只有一成之数，但可以明确的是耗羡征收率是统一规范应该是可信的。将“耗羡”附加税改为法定正税以此打击贪腐，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山西。

与此同时，由于清初承明朝旧制官至极品的俸银也不过180两、禄米180斛，而七品知县年俸仅45两。这使州县官员不能借以维持生活，而“火耗”成为正税之外无定例可循的附加税，其实质上是默许州县官在收税时加征银两，以补给俸禄的不足。雍正皇帝在实施“火耗归公”后便推行了“养廉银”政策。“养廉银”顾名思义，给官员以高薪，来培养鼓励官员廉洁习性，避免或减少贪污事情发生，因此取名为“养廉”。

最初湖广总督杨宗仁上奏雍正帝，提出了火耗提解藩库的建议，正合雍正帝的心意。雍正帝对此的批谕是：“所言全是，一无瑕疵，勉之。”“养廉银”出现雏形。随即在雍正元年四月(1723年)，雍正帝便命曾任户部主事的诺眠任山西巡抚。而诺眠五月到任后，上书雍正帝，希望将山西省一年的火耗的银两，提取存入司库，并且留二十万两，补贴财政亏空，剩下的分给官员为养廉的费用。此建议得到了雍正帝的赞赏。养廉银便由此推广。由于养廉银来自地方火耗或税赋，因此视各地富庶与否，养廉银数额均有不同，而一般来说，养廉银通常为薪水的10倍到100倍。清政府希望以此打击贪腐问题。

一系列反腐手段对山西的贪腐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由于清代的法律、制度、政策存在漏洞，使之在运行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看似高薪养廉，但并未彻底解决山西乃至全国的贪腐问题。(2014年9月3日《法制晚报》李冉)

◆评 论

反垄断要打准行政垄断的“七寸”

今年以来，有关部门把反垄断作为重点，展开了对汽车等行业的反垄断调查，对垄断行为“动真刀子”。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发改委于9月11日通报对一起行政机关的反垄断调查——河北省交通厅、物价局、财政厅规定河北省客运企业享受过路过桥费半价优惠，但其他省份车辆则不能享受该优惠，这涉及歧视性规定。国家发改委已给河北省政府发出执法建议函，建议他们责令这三个部门改正错误。

反垄断调查主体从企业扩展到行政机关，这是个值得注意的信号。

很长时间以来，各级政府掌握资源配置，决定产业发展，甚至直接参与某些产业投资。在这个增长方式下，政府投资的大量项目，很容易形成行政垄断的格局。这种“非市场化”或者“半市场化”，往往成为制约市场活力的重要因素。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市场决定”，就是要打破垄断格局，使社会资本能够“非禁即可”地进入到各个领域。由此实现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

因此，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相比，我国的反垄断既有反市场垄断的共性，更有反行政垄断的特性。对奥迪、微软、高通等企业的反垄断调研，是反市场垄断的举措。而与此同时，舆论关于打破行政垄断的呼声也非常高。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发改委对河北省的一项歧视性规定提出反垄断调查，是我国打破行政垄断的标志性举措。

客观地看，要打破行政垄断，恐怕还需要更强有力的力量。究其重点，恐怕以下几项最为迫切。

第一，加快打破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主要动力。目前行政垄断有很大部分集中在服务业中。这次河北通报的行政垄断案例，就是交通运输领域。要释放市场活力，需要加快打破服务领域的行政垄断，加快市场开放。尽快开放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打破现行的公用服务供给的行政垄断格局；构建平等准入的环境，放宽“准入门槛”。

第二，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尽快在竞争性领域退出，更加集中地投入到公益领域中，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对于交通运输这样的竞争性领域，完全可以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的方法加快发展。其中关键是加快政企分离，切断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特殊利益关系，消除不合理的行政保护和行政特权。当前，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取消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按照“市场化、职业化”要求，取消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不能再保留官员身份，削弱垄断企业在政治和社会中的影响力。

第三，尽快建立统一的国家反垄断执行机构。《反垄断法》把反垄断执法权集中到反垄断委员会，但反垄断执法权分散在三个部门——商务部反垄断局、发展改革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以及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当竞争执法局。适应反行政垄断的要求，需要尽快建立相对独立的、专业的反垄断执行机构，有效强化反垄断力量。(2014年9月13日《新京报》社论)

◆文 坛

诚信不是一个人的事

朋友最近很烦恼。留洋博士刚毕业，回国到一所重点大学应聘，对方告知，他的履历相当不错，条件也都符合，但是因为他们夫妻两地分居，来了之后可能“军心不稳”，因此还得“考虑考虑”。

朋友一打听，原来他所应聘的学院去年一气走了4个人职不过一两年的年轻教师，理由都是“两地分居，生活不便利”。4人同年离职，对于不过几十人的团队规模来说，可谓大动荡。“不明真相”的学界因此盛传，该学院待遇太差，评职称太难，逼走了年轻教师。

学院领导颇为气愤，却无可奈何，只好定下了“两地分居者不再录用”的“潜规则”。

朋友求职心切，找领导反复陈情，说明自己的特殊情况，并表态说，若得录用，一定会安心工作，不会见异思迁、充当“学术跳蚤”。领导用一种看透世事的语气说，那4个人刚来的时候，说的比你还真切。朋友一听，顿时语塞，陷入了“第22条军规”般的荒谬困境。

目前中国高校的人事制度并不顺畅，远远落后于时代，在此背景下，无论是离职4人还是院方的“潜规则”，均难以臧否。但此事却折射出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那就是不诚信的外部性问题。所谓外部性问题，是指一个人或一些人的行为或决定，可能影响另一个或一些本不相干的人。

一般我们认为，个人诚信与否，是个人品德问题，与他人无关。但是个人品德却不仅仅是个人问题，它还会通过外部性产生社会效果。一个人的道德亏欠，最终可能会“报应”到整个社会头上。一个不慎摔倒的老人讹了好心上前扶助的路人，除了自己遭受道德谴责，还会“威慑”其他好心人。长此以往，好人灭绝了，还有谁会去扶老人呢？而谁家没有老人呢？谁不会变老呢？

一个人不诚信，就像工厂排放污水一样，污染的是一大片。美国几个学者最近一个研究显示，各国学生给美国教授写信，想申请入学，结果中国学生收到回信的比例最低。这种结果不能不令人联想到中国学生申请留学时五花八门的作弊行为。他们行为的外部性，波及了所有想要出国深造的中国学生。

不诚信而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在当下中国处处可以找到印证，一些情况下甚至激发危机。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是一些医生不讲医德；群体事件频繁爆发的背后是一些官员闪烁其词；公知和专家污名化的背后则是谣言四起和知识的立场化与利益化；还有中国食品和中国制造在国际上名声不佳……

在经济领域，类似环境污染这样的负外部性是必须治理的对象，否则经济秩序可能走向崩溃。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和治理机制应当能够抑制负外部性，让始作俑者承担应有的责任，而不是让他人或者整个市场为之埋单。

同样的，不诚信的泛滥可能导致社会溃败，因此一个良善的社会应该在司法、政治、社会领域进行恰当的制度配备，抑制不诚信造成的外部性，进而减少不诚信的泛滥。例如，正因为官员腐败对整个政府形象会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因此政府应当大力反腐；职业失德会影响职业群体的声誉，因此职业共同体应该严肃处置不服从职业伦理的从业者，而不是一味护短……

公开性、契约自由、行业自治，以及奉诚信为黄金规则的司法制度，都是抑制不诚信的重要手段。在一个诚实得不到奖励，而厚黑却横行霸道的社会，所有人都可能像那个喊狼来了的小孩一样，落入恶狼之口。(2014年第11期《南风窗》叶竹盛)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总编辑：钟国兴 社长：王金龙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